

诠释，要非首尾如一、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不断迁易、不断流转。<sup>1</sup> 就此而言，钱玄同之所以备受讥讪，倒也是理所必至、咎由自取。事实上，民国初肇，临时政府固然通令全国剪辫易服，<sup>2</sup> 然而，新的服制规定，却非“高冠深衣”的汉官威仪，而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服饰。同样的，民国之后，不复排满，改而高揭五族共和之帜，于是，满、回、蒙、藏，“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群，居然亦跻身“国民”，蔚为“中华民族”的当然成员；而当年柳亚子所“不屑崇拜”的成吉思汗，<sup>3</sup> 遂亦同时被纳入中国“民族英雄”的新系谱，而与岳飞、文天祥诸人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矣。那么，由晚清“民族英雄系谱”所推动的近代中国国族想象，或许正如 Homi Bhabha 所言，乃是一个不断擦拭、不断重新书写的过程。<sup>4</sup>

## 【编者后记】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所谓“民族”或“国族”概念和清晰的“民族”边界。自秦朝统一中原后，中国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更替，逐渐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多部族大帝国。在民众起义、内部反叛和边疆部族入侵的交织过程中，该朝换代并不改变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延续，成为中国不同于其他地区大帝国的最突出的特色，即使一些边疆部族的领袖成为中原皇朝的统治者，他们所建立的新朝代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文化源流上都仍是“中国的”朝代。

有两件事是从汉朝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始终延续下来的：一是每个朝代都把中原文化（以孔子的儒学为核心）作为帝国文化的主线，并把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主要内容；二是在建立新朝后，都要依照中原皇朝的传统和历朝修史的格式，选派重臣为前朝修史，总结前朝的得失功过，评点前朝皇帝大臣。所以，中国这套《二十六史》成为汉朝以来各个朝代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政权兴衰和人物传记的编年史。

但自鸦片战争后，这一东方传统的“天下秩序”被帝国主义的洋枪炮舰迅速摧毁，源自西欧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民族”概念和“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也随之进入中国。“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民初的中国各族知识分子和精英们不得不在“救亡图存”的严峻形势下思考中国的前途，思考如何在被动接受的“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架构中来重新凝聚和构建自己的国家。

什么是“民族”？什么是“国族”？什么是“民族主义”？构成“民族”的要素是什么？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们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争论。本期《通讯》中选刊了台湾学者沈松桥先生的两篇文章，对一百年前人们对于中国“国族”的构建、如何讨论“炎黄子孙”等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希望能够对关心这一问题的朋友们有所启发。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破碎衰弱、任人宰割的中国，但是中国一些族群精英中仍然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对“中华民族”（或称“国族”）的认同并没有真正和全面地建立起来。这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从近邻苏联那里学来的“民族”理论和相关制度政策有关。但是，我们目前必须正视的是，正是我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全面学习和效仿的苏联，虽然发展成为当年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由于国内各族精英和民众对“苏维埃人民”这个共同体的认同并不牢固，结果建国 70 年后仍在政治改革运动中猝然解体。作为同样在多部族大帝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马列主义指导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苏联在许多方面都应当被看做我们的前车之鉴。

在境外敌对势力鼓励和支持下，我国一些地区近年来出现了以“民族”为单元和以“民

<sup>1</sup> Lloyd S. Kramer 曾以 Dominick LaCapra 为例，讨论如何将 Mikhail Bakhtin 的“对话想象”(dialogical imagination)理论运用于历史分析。参见 Lloyd S. Kramer,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13~14.

<sup>2</sup> 孙中山，“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1912年3月5日)，《孙中山全集》，卷2，页177~78。

<sup>3</sup> 亚庐(柳亚子)，“郑成功传”，页71。

<sup>4</sup> Homi Bhabha,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in idem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pp.291~322.



族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分裂活动。也恰恰是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在新世纪的历史关头，我们仍然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土地上、在 13 亿国民当中构建超越 56 个“民族”之上的“国族”这一问题。唯有使 13 亿人把自己的核心认同定位在“中华民族”这个层面上，才能使“中华民族”名实相符，真正使中国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我们的 13 亿国民对这个国家有着高度认同，那么什么样的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政治争论都打不垮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的 56 个“民族”具有自决独立的潜在愿望，那么我们将永远面临着分裂的风险，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挂在中国人的头上。

回顾百年之前，中国那些杰出思想家和学者对在中国如何构建“国族”的理论探索和争论，当年是坚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狭隘汉民族主义还是建构一个包容中华大地上所有群体的“国族”，相关的讨论、视角和论据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戎）

---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李健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

